

数字技术赋能高校思政教育高质量发展研究 ——以南宁师范大学为例

单秀丽, 黄洪辉, 梁银宇

南宁师范大学职业技术师范学院, 广西 南宁

收稿日期: 2026年6月15日; 录用日期: 2026年7月13日; 发布日期: 2026年7月20日

摘 要

数字技术赋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高质量发展, 是教育数字化战略纵深推进的核心议题, 但既有研究多停留于范式倡导或单维技术架构, 缺乏整合性分析框架与可操作化标尺。本文构建“技术-价值-实践”三维嵌套框架, 将高质量发展界定为育人效果深化、过程精准、要素协同与机制可持续的四维目标。以南宁师范大学为例, 通过298份问卷与19人次访谈展开混合研究, 发现赋能过程面临主体素养参差、数据孤岛与算法风险、伦理边界模糊、评价滞后等相互强化的结构性困境。据此提出四维协同路径: 分层培训提升主体数字素养与伦理责任; 依托“三三制”平台推动精准化内容供给; 打破数据壁垒并建立算法审查机制; 构建全过程动态评价与隐私保护机制。研究强调, 技术赋能必须以育人为根本遵循, 在尊重学生自主性与数据权利的前提下, 推动思想政治教育从经验驱动向数据驱动转型。

关键词

数字技术赋能,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 高质量发展, 数据治理

Research on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Universities Empowered by Digital Technology

—A Case Study of Nanning Normal University

Xiuli Shan, Honghui Huang, Yinyu Liang

College of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Education, Nann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ning Guangxi

Received: June 15, 2026; accepted: July 13, 2026; published: July 20, 2026

Abstract

Digital technology empowers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a core issue in advancing the digitalization strategy in education. However, existing research mostly remains at the level of paradigm advocacy or single-dimensional technical frameworks, lacking an integrated analytical framework and operational metrics. This study constructs a three-dimensional nested framework—technology, values, and practice, and defines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as four dimensions: deepened educational outcomes, precise processes, coordinated elements, and sustainable mechanisms. Taking Nanning Normal University as a case, a mixed-methods study based on 298 questionnaires and 19 interviews reveals structural challenges that reinforce each other during the empowerment process, including uneven subject competencies, data silos and algorithmic risks, ambiguous ethical boundaries, and delayed evaluation. Based on these findings, the study proposes a four-dimensional collaborative pathway: tiered training to enhance digital literacy and ethical responsibility among stakeholders; leveraging a “three-three system” platform to enable precise content delivery; breaking down data barriers and establishing algorithm review mechanisms; and building dynamic, full-process evaluation systems alongside privacy protection mechanisms. The study emphasizes that technological empowerment must fundamentally adhere to educational goals, promoti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from experience-driven to data-driven practices while respecting students’ autonomy and data rights.

Keywords

Digital Technology Empowerment,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Higher Education,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Data Governance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教育数字化已成为新时代教育改革发展的的重要战略方向。2022 年，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正式启动；2025 年 4 月，教育部等九部门印发《关于加快推进教育数字化的意见》[1]，进一步明确了数字技术赋能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路径。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虚拟现实、区块链等数字技术的快速迭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变革机遇。以 DeepSeek、ChatGPT 等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不仅重塑了信息传播与知识生产的方式，也深刻影响着大学生的认知习惯、交往模式与价值形成过程[2]。数字技术不再仅仅是教学辅助工具，而是逐步渗透到思想政治教育的育人场景、内容供给、方法手段和评价机制之中，推动传统思想政治教育形态发生系统性重构。然而，传统思想政治教育长期依赖线下课堂、单向灌输和经验驱动模式，在应对“数字原住民”一代时暴露出场景单一、供给滞后、评价片面等问题。部分教师将数字化简单理解为设备更新，或对技术持排斥态度，导致形式更新而模式未变。李铁英等指出，当前智慧思政建设中教师数字素养、平台利用与资源拓展均存在短板[3]；翟承宇的研究也表明，教师在数字理念与伦理素养方面存在隐忧[4]。单纯追求技术叠加而忽视价值引领，可能导致育人目标被技术逻辑裹挟。

既有研究多从单一视角切入：或侧重技术架构，或侧重价值导向，或侧重流程再造，但鲜有将技术

赋能与高质量发展进行整体性对接[5][6]。具体不足表现为：第一，对高质量发展缺乏可操作化界定，常将其等同于精准化或智能化；第二，对技术逻辑、价值逻辑与实践逻辑的相互嵌套关系缺乏整合分析；第三，对困境的剖析多为现象罗列，未识别其相互强化机制，导致对策碎片化。本文尝试做出以下增量贡献：其一，构建技术－价值－实践三维嵌套框架，揭示技术提供可能性边界、价值规定方向、实践展示运行方式的立体结构，超越既有研究的平面化偏重；其二，提出高质量发展的四维测量标尺——育人效果深化、教育过程精准、系统要素协同、发展机制可持续；其三，揭示主体素养不足、技术融合不畅、伦理边界模糊、评价滞后相互交织的结构性阻滞链条，并提出映射性的四维协同路径；其四，引入技术哲学与教育伦理学视角，对算法偏见、信息茧房等风险保持批判性反思。

本文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高质量发展界定为：聚焦育人效果的实质性提升、教育过程的精准适配、系统要素的协同联动及发展机制的可持续优化，而非规模扩张或设备先进。其本质特征是从经验驱动转向数据驱动，从同质化供给转向精准化育人，从结果考核转向全过程动态优化，从技术辅助转向技术－价值深度融合。然而，上述关于“技术－价值－实践”三维协同构成赋能机理的理论预期，在现实中是否成立？三维框架在实际赋能过程中是否存在维度间的断裂？如果存在，其表现形式与相互强化机制是什么？这些问题尚未得到充分的实证回答。为此，本研究以南宁师范大学为例，采用问卷调查、半结构化访谈与参与式观察相结合的混合研究方法，实证检验上述理论框架，系统识别赋能困境的结构性阻滞特征，以期为数字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参照与实践路径。

2. 数字技术赋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高质量发展的理论框架

数字技术赋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高质量发展，并非技术与教育的简单叠加，而是技术逻辑、价值逻辑与实践逻辑的有机统一。技术逻辑被理论界认为是提供赋能可能性边界的关键维度，价值逻辑规定了赋能的方向性要求，实践逻辑则展示了赋能的具体运行方式。三者相互嵌套、彼此支撑，共同构成数字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系统性变革的内在机理。

2.1. 技术逻辑：数字技术融合生态提供精准育人的技术底座

数字技术的迭代升级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支撑条件。大数据技术能够全样本采集学生在学习、生活、社交等场景中的行为痕迹，通过关联分析和趋势预测，精准识别学生的思想动态与成长需求。人工智能特别是生成式人工智能，实现了教育内容的智能生成与个性化推送，突破了过去统一供给、统一进度的模式。虚拟现实与增强现实技术构建出沉浸式育人场景，使抽象的理论知识转化为可感知、可交互的具身体验。这些技术各具优势又相互补充：大数据解决“识谁”的问题，人工智能解决“给什么”的问题，虚拟现实解决“怎么给”的问题。当这些技术形成融合生态，思想政治教育便获得了从经验判断走向数据驱动的技术底座，从而为精准识别、精准供给、精准评价奠定现实基础。

2.2. 价值逻辑：立德树人作为技术应用划定边界

数字技术赋能必须以育人为根本遵循，实现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协调统一。技术本身是中性的，但其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应用指向明确的价值观目标。高质量发展的核心不是技术设备的先进性，而是育人效果的实质性提升。数字技术能够提升教育效率、拓展教育场景、优化教育体验，但这些都服务于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一根本目的，增强对社会主流价值观念的认同。若脱离这一价值导向，技术赋能就可能退化为技术堆砌或形式创新，甚至因算法偏见、信息茧房等问题而偏离育人初衷。因此，数字赋能过程中的价值逻辑要求技术手段始终服从于育人目标，技术应用必须内嵌育人目标所规定的价值方向的筛选与引导机制，防止技术逻辑僭越价值逻辑。数据驱动的精准育人模式，其核心是服务于学生的成长，技术的介入是为了让思想政治教育更有温度、更有针对性，而非使人变成数据的附庸。

2.3. 实践逻辑：推动育人方式从粗放走向精准的系统性转变

数字技术赋能推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实现了从粗放式、同质化传统范式向精细化、个性化、智能化范式的转变。在育人对象层面，数字技术使教师能够突破经验局限，依托学生数字画像实现因材施教。在内容供给层面，数字化资源库和智能推荐算法使教育内容能够根据学生的认知水平、兴趣偏好和思想状况进行差异化匹配，有效缓解供需错位。在方法手段层面，混合式教学、沉浸式体验、互动式讨论等新型教学模式改变了传统课堂的单向格局，学生的参与感、获得感和认同感显著增强。在评价反馈层面，学习分析技术可实时追踪学生的课堂表现、线上行为和思想变化，形成动态成长轨迹数据，为教育策略的及时调整提供依据。

上述三重逻辑并非割裂关系，而是相互嵌入、相互支撑：价值逻辑为技术应用提供方向，技术逻辑为价值目标实现提供可行路径，实践逻辑则是技术与价值在真实教育场景中的结合与检验。据此，本文提出：三者的协同运转是赋能机制完整逻辑链条的理论预期。需要指出的是，上述技术 - 价值 - 实践三重逻辑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这一特定场景中呈现出独特的运行特征。与一般学科教育不同，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目标是价值观引导、政治认同塑造与信仰培育，其成效难以完全用行为数据量化，且高度依赖师生间的信任关系与情感联结。因此，数字技术赋能思政教育面临一个根本性张力：技术追求精准、高效，而思政教育追求“入脑入心”的价值内化。这一张力决定了技术讨论不能止步于效率提升，而必须追问：数据驱动的精准育人是否可能窄化学生的价值视野？算法推荐是否会削弱主流价值的优先传递？智能分析是否会异化为对学生思想的过度干预？下文对现实困境的分析，将围绕这些思政教育特有的问题进行展开。

3. 研究设计与方法

为检验“技术 - 价值 - 实践”三维嵌套框架及高质量发展四维目标在真实教育场景中的适用性，并系统识别数字技术赋能过程中的结构性困境，本研究采用解释性序贯混合研究方法。该方法首先通过问卷调查获取量化数据，以检验总体趋势与变量关系；继而通过半结构化访谈与参与式观察，深入解释量化发现背后的机制与动因，从而实现量化研究的广度与质性研究的深度之间的互补。

3.1. 案例选择

本研究以南宁师范大学为样本展开实证调研。该校 2025 年获批广西第一批“人工智能 + 思政教育”试点高校，自主设计了“三三制”微教学平台，积累了“一体三链”混合式教学与“AI 辅导员 + AI 心理咨询师”智能体等实践经验，且地处西南地区，具有区域代表性。需要说明的是，作为一项案例研究，本研究的结论主要提供理论驱动的机制解释与情境化的经验参照，而非统计意义上的总体推论。

3.2. 问卷设计及其理论依据

问卷设计是本研究量化数据的核心来源。为克服既有研究中常见的主观题项或经验罗列倾向，本研究的问卷设计主要依据以下理论资源。第一，技术接受模型与整合型技术接受理论。技术接受模型(TAM)及整合型技术接受模型(UTAUT)指出，用户对新技术的接受行为主要受“感知有用性”(perceived usefulness)和“感知易用性”(perceived ease of use)的影响，并受到社会影响及促成条件的调节[7]。基于此，教师卷中“是否能够基本操作学校提供的数字教学平台”(题项 1)对应“感知易用性”维度；“是否经常使用数据分析工具进行学情分析”(题项 2)反映“感知有用性”的行为转化；“数据不互通是主要障碍”(题项 3 的选项 A)则对应 UTAUT 模型中的促成条件维度。第二，数字原住民与信息茧房理论。关于“数字原住民”的论述指出，当代大学生成长于数字媒介环境，其信息获取习惯与认知模式存在代际特征[8]。信息茧房理论进一步揭示，算法推荐技术可能通过选择性呈现信息而固化既有认知[9]。学生卷中“短视频平

台推荐内容占日常信息获取时间的比例”(题项 4)和“通常只关注与自身观点一致的信息”(题项 5, 李克特 5 级量表)两个题项,即是对上述理论的操作化测量,用以评估学生信息环境的圈层化程度及其对思政教育可能构成的挑战。第三,数据隐私与知情同意理论。数据隐私框架强调,数据主体的知情同意是隐私保护的核心原则。学生卷中“是否清楚学校收集了您的哪些个人数据”(题项 6)与“是否对个人数据被用于分析感到担忧”(题项 7, 李克特 5 级量表)两个题项,借鉴了既有研究中关于“数据透明度”与“隐私担忧”的经典测量方式,用以评估当前数据治理中伦理边界的清晰程度。

在上述理论指导下,问卷分为学生卷和教师卷两个版本。学生卷共 15 题,涵盖人口学信息(4 题)、数字技术使用习惯(5 题)、信息获取与认知倾向(6 题,其中题项 5 为李克特 5 级量表);教师卷共 12 题,涵盖人口学与岗位信息(4 题)、数字技术使用情况(5 题,含行为频率题及多选障碍题)、对数据治理与评价体系的态度(3 题)。所有量表题项均经过 3 位教育技术学与思想政治教育领域专家进行内容效度评审,并根据预测试($N = 30$)反馈调整了部分表述。

3.3. 问卷调查

于 2025 年 11 月至 12 月面向南宁师范大学在校本科生发放电子问卷 312 份,回收有效问卷 298 份,有效回收率 95.5%。问卷包含三部分:数字技术使用情况(5 题)、信息获取与认知倾向(6 题)、数据感知与态度(4 题),其中 6 题为李克特 5 级量表。经 SPSS 分析,总量表 Cronbach's $\alpha = 0.86$, KMO = 0.82 (Bartlett 球形检验 $p < 0.001$),信效度良好。有效样本中,男生 118 人(占 39.6%),女生 180 人(占 60.4%);年级分布上,大一 72 人(24.2%),大二 96 人(32.2%),大三 82 人(27.5%),大四 48 人(16.1%);专业类别方面,人文社科类学生 162 人(54.4%),理工科类 108 人(36.2%),艺术体育类 28 人(9.4%)。样本覆盖了不同性别、年级和专业的学生群体,具有一定代表性。

此外,面向思政课教师、辅导员及教学管理人员发放教师问卷 45 份,回收有效问卷 42 份,有效回收率 93.3%。其中,思政课教师 24 人(57.1%),辅导员 12 人(28.6%),教学管理人员 6 人(14.3%)。正文中报告的教师相关数据(如 75.2%“能够基本操作平台”、30.5%“经常使用数据分析工具”、69.8%认为“数据不互通”是主要障碍等)均基于此 42 份有效教师问卷。

3.4. 半结构化访谈

采用目的性抽样,选取思政课教师(8 人)、辅导员(6 人)、教学管理人员(5 人)共 19 人进行一对一访谈,每人 30~50 分钟。受访者中,教师教龄 2~15 年不等,辅导员教龄 2~10 年,管理人员教龄 4~15 年;女性 12 人,男性 7 人;硕士学历 14 人,博士学历 5 人。访谈提纲围绕技术使用障碍、数据治理、伦理风险、评价体系等维度。所有访谈录音转文字后,采用主题分析法进行双人编码,初始一致率为 84%,经讨论达成最终编码,形成 4 个核心主题。

3.5. 参与式观察

研究者参与观摩 3 场数字化思政教学活动(包括“三三制”平台混合式教学、“AI 辅导员”互动演示),并记录课堂互动与技术使用情况。

3.6. 伦理保障

本研究严格遵守学术伦理规范。在数据收集前,研究者向所有参与者详细说明研究目的、数据仅用于学术分析、严格匿名处理,并承诺不泄露任何个人身份信息。参与者均自愿参与并可随时退出。所有访谈录音及问卷数据存储于加密设备,仅研究者本人可访问。本研究方案经指导教师审核,符合高校人文社科研究伦理要求。

4. 数字技术赋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高质量发展的现实困境

本研究构建的“技术-价值-实践”三维框架，为诊断现实困境提供了分析透镜。实证材料表明，赋能过程中的阻滞并非随机分布，而是集中体现在该框架的三个核心维度及其交互界面上：主体层面本质上是实践逻辑中“行动者能力”的短板；技术层面直接对应技术逻辑的不畅与技术异化；伦理层面正是价值逻辑未能有效规约技术应用的后果；而治理层面则反映了“技术-价值-实践”三者协同所需的制度保障缺位。四重困境相互强化，共同阻滞了数字技术赋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高质量发展。

4.1. 主体层面：数字素养参差与传统观念路径依赖并存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对数字技术的认知、接受和应用能力存在明显差异。调研数据显示，75.2%的受访教师表示“能够基本操作学校提供的数字教学平台”，但仅30.5%的教师“经常使用数据分析工具进行学情分析”。一位教师(T-04)在访谈中坦言：“平台上的数据分析报告我看过几次，但觉得跟我的课堂观察差不多，还费时间，后来就不怎么看了。”(受访教师 T-04，2025 年 12 月)这类表述印证了部分教师对数据驱动育人价值的怀疑，而非单纯的技术操作能力不足。访谈显示，部分思政课教师对智慧教学系统的应用仍停留在基础功能层面，对大数据学情报告的解读与教学转化能力有待提升(受访教师 T-03，2025 年 11 月)。教师数字素养是推进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创新发展的关键。当前部分教师对数字赋能存在认识偏差：要么将数字化简单理解为技术设备更新换代，要么担心技术削弱师生间的人文关怀。这种传统观念与数字思维的冲突导致技术引入后并未带来育人方式的实质性变革，出现了形式更新而模式未变的局面。在学生层面，调查发现38.3%的学生承认“短视频平台推荐的内容占据了我大部分信息获取时间”，31.2%的学生表示“通常只关注与自身观点一致的信息”。数字媒介环境下信息获取的碎片化与圈层化，使部分学生的价值判断日益受到社交圈层和算法推荐的影响，客观上增加了思想政治教育的难度系数。从学理层面审视，当前高校思政课教师数字素养提升面临教育理念新旧冲突、教师培训需求错位、评价体系初构未臻等多重困境[10]-[12]。已有研究指出，智慧教育赋能思政课建设中存在着教师数字素养有待提升、数字资源开放不足、“精准滴灌”难度加大等问题。上述数字素养问题在思政教育场景中产生了不同于一般课程的后果。受访教师(T-03、T-07)反映，即便能够操作数字平台，部分教师仍然难以将数据分析结果转化为价值观引导的具体策略；另一学生讨论区发言活跃但观点倾向性较强，平台数据无法捕捉其背后的思想成因。这说明，思政教育中的数字素养不仅是“会用工具”，更是“在数据支撑下做出价值判断的能力”。同样，学生的“信息茧房”倾向对思政教育的挑战在于：当学生习惯性回避与自身观点不一致的信息时，课堂上进行的主流价值引导就可能被预先过滤，技术反而成为价值传递的阻力而非助力。

4.2. 技术层面：数据孤岛、算法风险与技术异化相互强化

南宁师范大学在数字技术赋能思政方面已有较为扎实的基础。该校自主设计了集网络教学、课堂教学和实践教学于一体的“三三制”线上线下混合思政微课教学平台，截至2024年3月，该平台已累计创造600万的访问量、80万的登录次数和近20万条讨论记录，构建起以知识链、问题链、价值链贯通网络场域、课堂场域、实践场域的“一体三链”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新模式。然而，数据治理层面的挑战依然存在。调研发现，教务、学工、后勤等各部门的业务信息系统在数据标准、接口规范等方面缺乏统一性，形成事实上的“数据烟囱”。一位辅导员在访谈中表示：“我们想全面了解一个学生的综合情况，需要查阅学工系统、教务系统、‘三三制’平台等多个系统，数据无法自动关联。”(受访辅导员 F-02，2025 年 12 月)这种数据分割状态，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差异化育人的数据基础。调查问卷中，69.8%的思政工作者认为“数据不互通”是当前开展差异化育人面临的主要障碍。此外，随着“AI 辅导员 + AI 心

理咨询师”双核驱动思政教育智能体的建设推进,算法推荐可能带来的信息茧房和技术异化问题也开始浮出水面。访谈中,教学管理人员在访谈中指出,教师对学生画像系统的数据依赖需要适度关注,建议建立人机协同的工作机制以平衡数据分析与直接互动。这一问题虽然尚不普遍,但值得在后续建设中予以关注。由于本研究问卷未设置算法感知相关题项,该问题主要基于访谈反馈,尚需后续量化验证。数据孤岛在思政教育中的特殊危害在于,学生的思想动态是跨场景分布的——课堂发言反映认知层面,社交媒体互动反映情感倾向,实践报告体现价值内化程度。当教务、学工、后勤数据无法关联时,教师就无法形成对学生思想状况的立体判断,所谓的“精准价值引导”便无从落地。而算法推荐带来的“信息茧房”风险,在思政教育中尤为值得警惕:如果推荐系统持续向学生推送与其既有观点一致的内容,那么主流价值导向的引导就可能被算法过滤掉,这不仅是一个技术问题,更是一个育人方向问题。南宁师范大学的“AI辅导员”项目需要在后续建设中,主动嵌入价值引导的内容权重,防止算法中立性冲淡育人导向。

4.3. 伦理层面:数字赋能的伦理边界与潜在风险

数字技术赋能思想政治教育在提升精准性与效率的同时,也引发了深刻的伦理争议,亟需从马克思主义技术观与中国教育价值立场出发进行批判性审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揭示,机器体系若脱离人的支配,便可能异化为压迫人的异己力量[13];这一论断延伸至教育领域,意味着当数字技术从育人工具跃升为支配性力量时,受教育者便存在被降格为可计算、可预测的数据节点的风险。思想政治教育本质上是充满人文关怀的价值对话与心灵沟通,而非单向的知识灌输,必须坚守以人为本、尊重学生主体性的基本立场。

当前,数据隐私与知情同意的边界模糊构成首要伦理挑战。问卷调查显示,48.7%的学生表示“不太清楚学校收集了我的哪些数据”,33.9%的学生“对个人数据被用于分析感到担忧”。从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理论审视,学生不仅是教育的对象,更是具有独立人格和尊严的权利主体。当数据收集从显性的学习行为扩展到隐性的社交动态、情感倾向乃至价值偏好时,实质上构成了对个体私人领域的深度介入。若缺乏明确的伦理边界,技术赋能便可能滑向“数字全景监控”,侵蚀教育所必需的信任基础与情感联结,这与教育应有的人文精神背道而驰。因此,数据采集必须建立充分的知情同意机制,保障学生对其个人行为痕迹被记录、分析乃至用于画像建构的过程具有实质性掌控权,切实维护学生的信息自决权与隐私尊严。算法偏见与“信息茧房”风险同样值得警惕。智能推荐系统基于历史行为数据进行内容匹配,虽提高了分发效率,却可能通过“过滤气泡”固化学生的既有认知,窄化其精神视野。更为深层的问题在于,算法模型内嵌的价值预设往往处于“黑箱”状态,缺乏透明性与可解释性。若训练数据或推荐逻辑隐含特定的价值排序,则所谓的“精准供给”可能异化为隐蔽的单向度灌输,而非开放的思想对话与价值辨析。这不仅与思想政治教育旨在培养批判性思维、独立判断能力和创新精神的目标相冲突,也触及技术理性僭越价值理性的深层困境——当算法逻辑取代教育者的专业判断与人文关怀,教育的引导便可能蜕变为非人格化的数字操控。国内学者关于算法伦理的研究指出,算法治理必须坚守“人是目的”的价值底线,防止技术从服务育人的手段反转为规训思想的工具,确保技术运行始终服从于育人的根本方向[14]。

此外,对学生自主性的过度干预风险亦不容忽视。“精准识别”与“差异化推送”若走向极端,可能演变为对学生思想轨迹的过度介入,压缩其自主探索、价值试错与自我建构的空间。马克思主义强调,人的本质在于其主体性与社会性的统一,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使命是培育具有独立人格、批判精神和责任担当的时代新人,而非塑造被动接受信息“投喂”的依附性个体。青年具有较强的创新活力与探索精神,教育应注重激发学生自我成长、自主发展的内生动力。因此,数字赋能必须划定清晰的伦理边界:

技术应用应以辅助教育者的价值引导为限，而非替代学生的自主思考；数据驱动应服务于育人过程的优化，而非将学生转化为完全透明的数据客体。只有在尊重学生自主性、保障数据权利、维护算法透明的前提下，技术赋能才能避免陷入工具理性压倒价值理性的伦理陷阱，真正实现“科技向善、育人为本”。

4.4. 治理层面：评价体系滞后与数据安全机制缺位

调研发现，当前南宁师范大学对思政课教学的评价中，数字化教学指标虽已纳入评价体系，但权重有限，且多为过程性记录而非育人效果的实质性评估。现有评价体系仍以听课评课、期末评教等传统方式为主，对学生在数字平台上的思想成长轨迹缺乏系统化的过程性与增值性评价机制。“我们关注了学生在线学习的完成率和讨论参与度，但这些过程性数据如何转化为对思政教育效果的判断，还没有成熟的指标体系。”(受访管理者 A-01, 2025 年 12 月)

在数据安全与伦理方面，随着数据分析技术在学生管理中的应用深入，数据收集范围、使用边界和隐私保护问题日益凸显。如前文伦理层面所述，相当比例的学生对数据采集范围缺乏清晰认知并对数据用途感到担忧，这直接反映了当前数据安全机制的不完善。2025 年 9 月获批的“人工智能 + 思政教育”建设项目虽然明确了“数据赋能、智能响应与精准育人”的建设理念，但在具体实施中，数据采集的知情同意机制、数据使用的监督制度以及学生数据删除权的保障等问题仍需进一步明确和规范。

上述四重困境相互关联：主体素养不足限制了数字平台的使用效能，技术融合不畅进一步削弱了教育工作者的应用信心，伦理边界模糊导致技术应用缺乏价值约束，评价体系滞后使赋能成效难以有效验证，数据安全隐患则使学生产生信任顾虑。这些相互强化的结构性问题，要求从系统视角探索突破路径。

5. 数字技术赋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实践进路

5.1. 主体维度：分层培训提升数字素养，构建协同育人共同体

主体素养是数字技术赋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条件。针对访谈中反映的教师数字素养参差问题，南宁师范大学可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数字能力培养纳入教师发展整体规划，开展分层分类培训。对数字基础薄弱的教师，重点培训“三三制”平台操作、学情数据分析工具使用等基本技能；对具备一定基础的教师，引导其将数字技术深度融入教学设计、学情分析和个性化干预环节。培训方式宜采用线上线下结合、案例研讨与实操演练并举。南宁师范大学应依托“AI 辅导员 + AI 心理咨询师”项目建设，打破思政课教师、专业课教师、辅导员、教学管理人员和信息技术人员之间的部门壁垒，建立常态化协作机制。可定期组织数据会商、案例分析和协同干预，推动各主体在数据共享和育人协同上形成合力。在学生层面，可通过主题班会、信息素养课程等形式加强数字媒介素养教育，引导学生提升信息甄别能力，主动跳出“信息茧房”。提升主体素养最终目的不是让教师“更会用技术”，而是让教师在技术辅助下守住价值引导的主阵地，确保数字素养服务于而非削弱师生间的人文互动与价值对话。

5.2. 内容维度：依托“三三制”平台优势，推动精准化内容供给

内容精准是差异化育人模式的核心载体。精准推送的根本目标不是“提高学生点击率”，而是确保每个学生都能接触到与其思想成长阶段相匹配的价值引导资源，使差异化供给服务于价值观培育的真实效果。南宁师范大学应充分发挥“三三制”微教学平台已积累的内容资源和用户基础优势，持续丰富数字化资源库建设。将经典理论资源、国家发展历程、优秀传统文化等核心内容转化为短视频、动画、虚拟仿真课程、交互式案例等形态，注重根据“00 后”大学生的信息接收习惯进行再创造。在内容供给上，可依托平台已积累的近 20 万条讨论记录和 80 万登录数据，通过对学生讨论热点、阅读偏好、思想困惑的持续分析，实施差异化推送：对理论功底薄弱的群体推送阐释性内容，对思想活跃的群

体推送思辨性内容，对出现困惑或偏差的群体推送引导性内容。“一体三链”模式以“知识链”“问题链”“价值链”三链条贯通网络、课堂、实践三场域的设计，为内容的精准匹配和递进延伸提供了良好的结构支撑。

5.3. 技术维度：打破数据孤岛，建设一体化智能平台

技术融合是打破数据壁垒、实现全过程支撑的关键保障。需要强调的是，技术融合的最终指向是提升思政育人效能——数据平台应成为教师“看见学生思想动态”的窗口，而非取代教师判断的“黑箱”；人机协同机制的核心是让技术服务于而非替代师生间的价值对话。针对调研中发现的数据分割问题，南宁师范大学应从顶层设计入手，依托“一站式”智慧服务体系建设的契机，推动建立统一的数据标准和接口规范，逐步将分散在教务、学工、后勤、“三三制”平台等部门的学生数据汇聚到统一的思政数据平台。该平台应具备数据采集、清洗、存储、分析、可视化等全链条功能，在合法合规前提下生成学生的动态成长档案和数字画像，通过多源数据交叉分析发现学生思想行为的变化规律和潜在风险。在算法应用方面，南宁师范大学应在“AI 辅导员 + AI 心理咨询师”双核驱动智能体的建设中，建立内容推荐的伦理审查机制，在满足个性化需求与坚持正确价值导向之间取得平衡，主动嵌入符合教育价值导向的内容权重，并定期对算法模型的偏见风险进行评估与纠偏。同时建立人机协同的工作机制，防止对数据和算法的过度依赖，确保数据分析结论服务于而非替代师生间的人文交流。

5.4. 评价维度：构建数据驱动的全过程动态反馈机制

评价优化是驱动育人过程持续改进与闭环迭代的动力保障。南宁师范大学可借助“三三制”平台、SPOC 课堂等数字化教学场景，建立涵盖课前、课中、课后、线上、线下全场景的数据采集体系，实时追踪学生课堂参与度、讨论质量、实践表现等多维信息。评价指标既要涵盖学习行为数据等量化指标，也要兼顾社会实践报告质量、讨论发言深度、志愿服务表现等质性指标。引入增值评价理念，关注学生接受教育前后的成长进步幅度[15]。建立“建设 - 采集 - 评估 - 反馈 - 迭代”的闭环机制，将评价结果及时反馈给教师、辅导员和管理部门，定期生成思想政治教育质量报告，实现评价对育人实践的持续优化驱动。在数据采集与使用环节，应建立严格的知情同意与隐私保护制度，明确学生数据的收集范围、使用边界与保存期限，保障学生的数据查阅权、更正权与删除权，将伦理合规性纳入评价体系的底线要求。数据驱动的过程评价最终应服务于一个根本判断：学生的价值观是否在朝着积极方向发生真实变化，而非仅仅记录行为痕迹。评价的闭环必须回归到育人效果的实质性提升上来。

6. 结语

本研究以获批第一批全区高校“人工智能 + 思政教育”建设项目试点高校的南宁师范大学为案例，通过问卷调查、深度访谈和参与式观察等实证方法，系统分析了数字技术赋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逻辑机理与现实困境，并构建了与困境相互映射的四维实践路径。本研究通过案例实证增强了“技术 - 价值 - 实践”三维框架的学理合法性；揭示了主体数字素养参差、数据孤岛与算法风险、伦理边界模糊、评价体系滞后等四重困境在具体高校中的表现形态及其相互强化机制；以南宁师范大学的实践探索为基础，为资源条件相似的中西部地区高校提供了初步的、情境化的经验参照。作为一项案例研究，南宁师范大学作为西南地区高校的代表，其发现对于资源条件相似的高校具有一定参考价值，但东部发达地区高校的数字化水平可能更高，本研究的结论需谨慎外推。

基金项目

1. 南宁师范大学学生工作课题(课题编号 2025XG19)立项资助；
2. 南宁师范大学学生工作课题(人工

智能融入高校学生管理的机制与实现路径研究 2025XG01)立项资助阶段成果。

参考文献

- [1] 教育部等九部门关于加快推进教育数字化的意见[J]. 中国教育信息化, 2025, 31(4): 3-8.
- [2] 梅兵. 高校教师数字素养提升: 现实问题与体系构建[J]. 中国高等教育, 2024(12): 50-54.
- [3] 李铁英, 冉瑞涵. 数智技术赋能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现状及进路[J]. 林区教学, 2026(2): 21-26.
- [4] 翟承宇. 数字时代高校思政课教师数字素养的价值意蕴、现实隐忧及提升路径[J]. 浙江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 2025, 54(1): 121-128.
- [5] 于祥成, 陈梦妮. 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范式建构的逻辑向度及实践路径[J]. 思想理论教育, 2023(6): 88-94.
- [6] 赵建波. 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内涵要义、现实挑战及实践策略[J]. 思想理论教育, 2023(3): 85-90.
- [7] 孙元. 基于任务-技术匹配理论视角的整合性技术接受模型发展研究[D]: [博士学位论文]. 杭州: 浙江大学, 2010.
- [8] 曹培杰, 余胜泉. 数字原住民的提出、研究现状及未来发展[J]. 电化教育研究, 2012, 33(4): 21-27.
- [9] 王天民, 郑丽丽. 智能思政“信息茧房”的生成机理与治理路径[J]. 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5): 30-42.
- [10] 盖逸馨, 浩日娃. 新时代高校思政课教师数字素养提升的价值意蕴、现实困境和策略探析[J].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2024(8): 118-124.
- [11] 张宏伟, 孙晓雯, 程恩思. 高校思政课数字化转型的现实困境及应对路径[J]. 高教论坛, 2024(7): 14-18.
- [12] 宋佳, 潘建红. 高校思政课教师数字素养提升的阻碍及对策建议[J]. 中国德育, 2023(10): 28-31.
- [13] 卡尔·马克思. 资本论[M].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13.
- [14] 董圆圆. 人工智能赋能思想政治教育的伦理风险及其应对[J].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37(1): 160-165.
- [15] 徐蓉, 王潇. 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增值评价[J]. 思想理论教育, 2021(8): 67-72.